

# 创伤体验对《我是猫》创作影响的研究

谢孙炜

大连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116622

**[摘要]** 夏目漱石所经历的舆论中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加之过往生活中的各种生离死别以及身体上的负担，导致其身心疲惫有神经衰弱的迹象。《我是猫》的创作作为其治疗神经衰弱中的一个环节，作品中的各种人物以及场景的设定都与其创伤体验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为了摆脱神经衰弱问题，他开始用文学复现创伤情景，以求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

**[关键词]** 夏目漱石；我是猫；创伤体验；心理创伤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2.1574

## 1. 引言

《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其处女作。于1905年1月发表于《杜鹃》，广受好评。近百年来，围绕《我是猫》的论点众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分析、社会讽刺等方面。夏目漱石经历过一系列的创伤体验，而创伤体验会对创作取材、创作意图、创作风格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其作品《我是猫》为基础，将文章分为“《我是猫》创作前的作者生平”与“作品中的创伤体验表现”两部分，分析阐明夏目漱石的创伤体验如何影响了《我是猫》这部作品的创作。

## 2. 《我是猫》创作前的作者生平

夏目漱石出生就被家庭所不耻，后家道中落，被送往盐原昌之助家做养子。但由于养父母家庭不和，夫妇二人不久后便离异。“无爱的家庭、暴力的家庭，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往往产生不良的影响，但这也会成为其创作的力量”（王源，2006）。在《我是猫》“我”的登场中，“原先那么多兄弟姐妹也一个看不见了，就连我那最最亲爱的妈妈也去向不明”（夏目漱石，2014），被母亲、兄弟姐妹所抛弃、可怜无助的“我”与幼年被家庭所抛弃的夏目漱石相联系到了一起，童年的创伤体验与小说的情节设定进行了有机结合。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对于作家夏目漱石来说，只是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精神危机的种子，真正导致其心理创伤的事件还是发生在其青年时期。

因病导致的升学落榜、近亲的接连去世，肺结核缠身、留学生活的窘迫、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风评被害事件。各种疾病的困扰，加之来自外界的压力和亲人的相继离世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创伤体验。“创伤体验是一种强烈的、持久的、难以摆脱的心理创伤”（王威龙，2021），像这样长期性、持久性的伤害势必会影响其创作风格，而事实也证明《我是猫》中众多的人物以及场景设定都与其创伤体验相关。

《我是猫》中充满了对人以及拜金社会的批判，“创伤体验的强度、持久性不但影响人的社会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且会改变人生之路的走向”（贾振勇，2010），从他的生平来看，不难理解夏目漱石为什么会厌

以及厌恶旁人。“对遭受创伤的作家来说，文学书写是愈合创伤的有效手段”（高丽等，2017），《我是猫》的创作作为治疗其神经衰弱的其中一环，让夏目漱石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

## 3. 作品中的创伤体验表现

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学作品从多个角度委婉地展现了作家的生活经历以及情感体验。本节将会把夏目漱石分为“猫”这一内在的“我”和“苦沙弥”这一外在的“我”，具体分析作品中的相关创伤体验表现。

### 3.1 夏目漱石的内在“我”——“猫”

夏目漱石不止一次借“猫”这一形象叙述着“人性的丑陋”。精神压迫、不良的心理体验所带来的沉重的心理负担，让其开始消极对待事物，对外部世界产生敌意。第一章中已开始表现对人的敌意。“我第一次看见的那个人是个‘书生’，是人类当中最凶恶粗暴的一种人。据说就是这类书生时常把我们抓来煮着吃。”（夏目漱石，2014），“别看他们是人类，也未必永远繁荣昌盛吧。让我们耐心等待‘猫儿走运的时代’到来吧！”（夏目漱石，2014），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期间的谣言中伤，让其对学生这个群体格外厌恶，甚至延伸为整个人类群体。这里所描写的凶恶粗暴的学生，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敌意正是其创伤体验在其作品中的一个缩影。本想努力做个好老师，却被丑陋的人性推到了深渊深处。他只能刻画成一个又一个内心丑陋的怪物，通过文字的形式抒发自己内心的不满，从而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

“我”这个人物设定的设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夏目漱石心中的矛盾与纠葛。“三毛姑娘死了，和老黑又合不来，我多少有些寂寥之感，所幸在人类中有了知己，也就不感到怎样沉寂了”（夏目漱石，2014），内在的“我”终于在猫的世界里失去了所有的猫朋友，观察人类世界又讨厌人类的“我”却又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类的模样”。对于这种态度上的前后转变正是夏目漱石隐藏在内心的真实想法，态度的转变实质上是其对于朋友的渴望。对夏目漱石来说，文学既是治愈心灵的东西，也是面对创伤体验的自我救赎。“有人特地把冈山的名产‘吉备糯米团子’寄来指名给

我。随着人类对我寄予同情，我逐渐忘却自己是只猫儿。我似乎觉得自己不再是猫儿，已逐渐向人类靠拢了。”（夏目漱石，2014）。猫的形象有着夏目漱石的影子，可以看到作者假借猫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在现实中因人际关系而苦恼的夏目漱石，在作品中假借猫这一形象，展现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另，“我辈”一词是当时知识阶层使用的词汇，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我”表达着夏目漱石的心声，可以看做是其内在的一个分身，替夏目漱石阐述着自己所不能表达的事情。夏目漱石在遭受种种创伤后，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自我安慰的乐园。最后内在的“我”在溺水的状态下也冷静地对自己进行了分析，“我就要死去。死，获得了这种宁静，如果不死是不可能获得这种宁静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感谢呀感谢”（夏目漱石，2014）。厨川白村说：“艺术是苦闷的象征”。通过死亡这一结局，“我”从充满冷酷、残忍、丑恶的世界中离去，得到了心灵的解放和自我的救赎。《我是猫》结尾的强烈厌世观，委婉地表现了其追求以及愿望，以猫死亡展现了夏目漱石无声的抗争与自救。

### 3.2 夏目漱石的外在“我”——“苦沙弥”

夏目漱石早期的创伤体验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可抗力以及不良的人际关系。“夏目漱石被称为‘疾病百货商店’，他是一名多病却有才的人，患有胃溃疡的顽疾，还患有神经衰弱、痔疮病、糖尿病等疾病”（山崎光夫，2018）。《我是猫》中所反映的主要是胃病、厌世病以及严重的神经衰弱。“他消化不良，所以皮肤淡黄，缺乏弹性，没有生气。可是他食量很大，每次填饱肚皮之后，就吃胃散。”（夏目漱石，2014），这描写“苦沙弥”胃病的情形与夏目漱石本人的胃病如出一辙，从“苦沙弥”的阶级和经历来看，与夏目漱石的关系也十分相似。可以认为，这是夏目漱石以自身为原型所设的形象，一个无限接近于自己本身的自我，一个外在的自我。

不仅是身体上病痛折磨，心理上的病痛也同样折磨着夏目漱石。“就在这时，篱笆外的三四个人发出嘲笑声。一个人说：‘真是自高自大的死木头！’……主人气得火冒三丈，一把抓起手杖，跑到街上去。……我为了去追主人，从篱笆的缺口跑到街上一看，在胡同的当中，主人好像被鬼迷住一般，空拄着一根手杖站在那里。路上空荡荡，连个人影也没有。”（夏目漱石，2014），在与迷亭的对话中，苦沙弥听到邻居们嘲笑自己便跑出去对峙，内在的“我”即猫也一并跟了出去，但是外面却空无一人，只看见苦沙弥一个人在那里发疯，这何尝不是一种幻听·幻觉现象。李璐寰、童辉杰（2018）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着这样的叙述“创伤后应激障碍至少会持续一个月，其特征为创伤或灾难性事

件后长期存在的焦虑反应，主要症状为持续的警觉性增高症状群、反复发生的闯入性再体验症状群、反应性麻木症状群。”从侧面来看，正是因为现实中夏目漱石受到过舆论的伤害，才无法忍受对于自己的中伤辱骂，有受到过心理上的创伤，且在现实中无法宣泄，以至于只有借用文学作品才能抒发自己的情绪。幻听·幻觉的场景在作品中的再现也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症状即闯入性再体验症状群的表现，同时这也反应着作者创作时的精神状态。此外，“镜子夫人在《漱石的回忆》（改造社刊）中写道，夏目漱石以千驮木的居民为对象，有被幻听和妄想所困扰的经历”（高桥正雄，2018）。“苦沙弥”这个人物实质是夏目漱石对于自身的文艺性描写，“苦沙弥”的幻听·幻觉既是创伤体验带来的直接表现，也是创伤阴影的扩大和事实上的再构造。创伤体验所带来的幻听·幻觉同时影响着其创作过程中的场景设定。夏目漱石通过“苦沙弥”这一人物，直接真实地表现了其身体状况以及心理状况，直接再现了其生活以及情感体验。

### 4. 结语

舆论伤害所带来的创伤体验，可以说是夏目漱石一生生涯中的痛点，若非这场风波夏目漱石的文学之路也不会开始的那么早。夏目漱石通过塑造内在的“我”，也就是猫这一形象以及塑造外在的“我”，也就是“苦沙弥”这一形象，一虚一实相结合，再现了创伤体验所造就的真实自我以及现实中的自我。夏目漱石以虚构和幻想的力量，在虚构的世界中创造了暧昧但确真实的自我，走上了治疗和疗愈自己创伤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王源. 童年创伤体验与作家创作的深层关系[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3): 171-174.
- [2] 夏目漱石. 我是猫[M]. 刘振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3] 贾振勇. 掙住黑暗的闸门: 创伤体验与鲁迅的自我救赎[J]. 鲁迅研究月刊, 2010(02): 25-31+37.
- [4] 高丽, 张瑞英. 张爱玲的战争创伤体验与文学书写——从《烬余录》谈起[J]. 东岳论丛, 2017, 38(10): 152-160.
- [5] 山崎光夫. 胃弱·癩癩·夏目漱石 持病で読み解く文士の生涯. 講談社, p1. 2018
- [6] 李璐寰, 童辉杰. 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进展[J]. 社会心理科学, 2008(01): 100-102.
- [7] 高橋正雄. 漱石の病識—「吾輩は猫である」と「野分」. 週刊日本医事新4922号, p68. 2018